

文明的

創痛

面对创伤

——自序

转眼就到了1998年的冬天。我到北京已经整整五年半了，至今仍然不适应北京冬天的寒冷。在一个冬日罕见的温暖的阳光中，我独坐在未名湖畔，时而冷眼，时而热眼，终于将桃红柳绿看成了疏影横斜，将莺歌燕舞看成了衰草枯杨。记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尝言：“人一生中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我则目睹了湖水由解冻到封冻、再由封冻到解冻的整个过程；同样，湖水目睹了我由热忱到焦灼、由焦灼到沉郁的整个过程。在与博雅塔相看两不厌的时光里，我让自己的思想像湖畔的鸟雀一样四处飞散自由觅食。我是一个不喜欢言谈的人，因为言谈多半与心灵无关。旷达如东坡，也曾叹惜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对我来说，小舟是用不着的，只要能够在湖边最宁静的一角独坐就行了。其实，在这贫乏的人世间，独坐是一种真正的对话。

有价值的写作是我到北大以后才开始的。我感激北大对我丰厚的馈赠，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北大现状的严厉批评。

在北大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五年半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文章来,它们大部分无法发表,被我塞到抽屉里,我美其名曰“抽屉写作”。而从“抽屉文学”变成“桌面文学”,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后来却又比我想像中的要容易。当《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相继问世以后,这些文字不再属于我私人所有,它们进入了公众领域,有誉者,有毁者,有共鸣者,也有忌恨者,不过种种评价都已经跟我本人无关。它们是最宝贵的那段青春岁月的最客观的见证,但那段岁月毕竟已经过去。我又开始了新的写作。

林贤治先生来信说,要我编一本自选集,跟他的作品以及谢泳先生的作品一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来,像我这样的年龄是不宜编选自选集的,更何况林、谢两位先生都是我所尊敬的作家,让我与他们并列在一起,我很是忐忑不安。但是林贤治先生和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高为先生的美意又让我难于拒绝。再加上《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两本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分量太大,选文有点宽泛,所以我也觉得,从前面的两本书中选出一部分自己认为最好的作品来,再加上一部分近作,编成一本自选集,倒也并非多此一举。这本自选集中,有一半的文章是《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两本书里已经收入的。另外一半,有的是从我的研究清末民初笔记的专著《尴尬时代》中挑选出来的,有的是从我刚刚完成的反思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长篇报告文学《阴影下的大学》中选出的章节,有的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散文、杂文和文学评论。我把这本自选集的名字定为《文明

的创痛》，因为这些文字是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青年的最真切的外化，这些文字所集中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明为什么是一种伤痕累累的文明？它何以受伤，又如何进行治疗？这些问题“剪不断，理还乱”，我远远没有将它们解决，只是提出来而已，希望更多的同道来思考并解决。

疼痛不是最糟糕的处境，最糟糕的是对疼痛的麻木。每一个能够感觉到疼痛的人，都是我的同行者。让我们一起同行，抱着微茫的希望。

1998年冬于京西燕园

90535779

文明的伤痛

Her pills may have wholesome
effects.

目 录



伤
自 序

第一辑 伤痛文明

国	(3)
来最黑暗的一天	(20)
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生的人	(29)
察我怕谁	(32)
生存	(37)
卒的镜子	(42)
尴尬时代》序	
监	(46)
子孙们	(54)
判	(62)
浒》	(69)
震惊海内	(87)
罗《耻辱者手记——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精神体验》序	

文明的创痛

龙飞九天	(95)
------------	------

——徐晋如《胡马集》序

第二辑 坐看云起

牛	(103)
屠杀的血泊	(107)
女人与盲歌手	(112)
妹 妹	(116)
水边的故事	(119)
父亲的自行车	(124)
今夜飞雪	(127)
欲望号街车	(132)
残缺之美	(136)
薄酒与丑妻	(141)
给爱一个容器	(145)
绝望之爱	(155)
激越之爱	(165)

第三辑 大学内外

“勇敢者”游戏	(177)
——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孤独的蔡元培	(190)
爱“嘘”之心	(204)
新子不语(三则)	(209)

北大蜀人,星光灿烂	(216)
冷看中国“考研热”	(228)
那塔,那湖	(237)
毕业生	(245)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255)
玩知丧志	(259)
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264)

第四辑 文学园地

少年气盛说文章	(279)
我来剥钱穆的“皮”	(286)
皇帝的新衣	(296)
——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	
“单调”散文	(314)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杞人何必忧天塌?	(320)
——就《开卷无益王小波》一文致吴小如先生	
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329)
重建巴比伦之塔	(338)
——王安忆《乌托邦诗篇》文化意义的阐释	
归与不归	(347)
——苏东坡生命历程中乡愁的强化与消解	
地中海的阳光	(356)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第一辑

伤痛文明

太监中国

紫禁城。游人如织，一双双好奇的眼睛，一张张天真的容颜，一声声惊异的叹息。中外游客争睹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呼风唤雨的几条巨龙似乎要从九龙壁上飞下来，现代叶公们不停地拍照。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北中国惯有的灿烂的阳光，熙熙攘攘中，我却一口口地倒吸凉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冷——无论在巍峨雄伟的三大殿外，还是在曲径通幽的御花园里，我不停地打着寒战。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间，没有一间亮丽堂皇，光线被冷漠地隔在房间外，只有残余的几束从小小的雕花的窗眼偷渡进去。在这几束光中，有无数的灰尘在飞舞，如昔日的霓裳舞曲。

没有参观者会注意这个小小的、破落的房间。我却注意到了。它位于西华门附近，官方的名字叫“净身房”，民间的名字叫“场子”。

谁也不知道，皇朝文明的“精髓”就藏在这间房子里。

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

证，甲骨文中已有相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西方直到希腊文明晚期才有关于“阉人”的记载，今天英文中的 eunuch 便是从希腊言语中沿用而来。《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中记载：“他是天生的阉人，有被人阉的，但也有为天国而自阉的，能够接受他的人就接受他吧！”这句话是要令国粹家们失望的：怎么，蛮夷之邦也有阉人？呸，红胡子绿眼睛，他们算什么东西！

不过，国粹家们确实有骄傲的本钱：没有哪个国家的太监有中国这么多，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会在这样大的程度上受到太监的支配，即使是雄踞西亚与我们并称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

上帝造出了亚当和夏娃两种性别，殊不知东方还有个民族，运用他们卓越的魄力与想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第三性。”上帝，在他们的成就面前低下你高贵的头颅吧！

幸亏我们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在汗牛充栋的典籍中，我发现了创造“第三性”的方法：被手术者仰面躺下，两名助手一名按住他的双肩，一名分开他的双腿。用白色的绳子或纱布将手术者的下腹及腰间上部绑紧，用热胡椒将阳具附近仔细洗三遍，然后用一根极韧的细丝系在阳具的尽头，另一端系在屋梁之上。这时，“刀子匠”上场了。所谓“刀子匠”，是公认的行业专家，是人人眼红的一种技术型的职业，一次手术的收入抵得上小康之家一年的开支。“刀子匠”拿起镰刀状的小刀，先用手感觉一下阳具的大小，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便将阳具及阴囊一起切除。无论怎样凄烈的惨

叫，都无力回天了。之后用白蜡的针形栓插入尿道，伤口则用浸过冷水的纸小心地包起来。手术完成后，被手术者由两名助手扶着在房间里走动二至三小时，然后才允许躺下。三天之内不许喝开水，据说这段伤痛及口渴的时间最是痛苦难熬。等过了三天之后将栓拔出，如果尿像泉水般涌出来就表示手术完全成功了，否则便是失败。大约手术后一百天才能基本痊愈。至于割下来的阳具，则呈送大内有关部门放在瓶子里，置于房间的高处，取“高升”意，祝福该名未来的太监飞黄腾达，荣登高位。

一个帝制大厦中的尤物又产生了。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似长了癭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我在古籍中看到了一些年纪不等的太监的画像，经过比较发现：年轻时被阉的宦官会逐渐发胖，但肌肉却柔软不结实，当然也无缚鸡之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又会

持续下降,而且皮肤易生皱纹,往往四十岁的宦官看起来就像六十岁的老人一样。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朋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王夫之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大发了一通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收养,死无与殡。天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内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腐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稔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惜,子孙之虑耳,故恟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船山先生的推论大

抵是正确的，汉、唐、明三代都有皇帝死于太监之手，这大概是发明太监管制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吧。船山先生隐晦地讽刺了君主们作茧自缚的行为。正所谓“害人终害己”。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管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管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侔，更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太监的来源，多为战争俘虏和贫寒之子。如明英宗时征苗，便阉了苗族贵族男童一千五百六十五人，显然有种族灭

绝的动机在其中。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入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征募宦官缺额三千人，结果应征者多达二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无措，不得不增加一千五百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丐阉》中记载：“至有兄弟俱阉而无一选者，以致为乞为劫，固其所宜也。”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宦官职位依统辖内容的不同，区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有“影子内阁”之称，其执掌太监权重于首辅大臣。而令官民谈虎变色的特务机构，也全在太监的控制中：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的头目清一色全是太监，太监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没办法维持。所以，净身房

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今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苦耻辱而告终？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噬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是一步之遥。当“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十万，在天朝大国只算

沧海一粟。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忠、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与资源就愈少。当教